

## 第六章

### 結 論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在於指出，中共在一胎化政策之中對於性別所存在的一種矛盾態度。關於一胎化政策所帶來的性別影響眾說紛呈，國家的角色看似在總體社會利益的基礎上努力維持生育的性別中立性，並以「再生產的降低將帶來生產的提高」此邏輯解釋一胎化政策對於兩性地位的影響。然而中國的性別人口比例究竟是失調，而且這樣的失調短期之內也未見可以因國家的努力而改善的趨勢（見圖二）。1995年所開始的幸福工程以及2003年開始推動的關愛女孩都沒有實際性的能夠降低出生性別比。因此本文試圖自國家政策面的角度來加以論析國家如何看待性別以及其解決方式，中共結合了國家發展性需求與性別意識形態需求以支撐其所謂再生產與生產的關係，並以此說明一胎化政策將有利於婦女的發展，而本研究提出如下的幾個論點反駁，並於之後的段落分敘之。

1. 中共的「再生產降低將幫助婦女進入生產從而提高地位」的說法來自恩格斯，但是恩格斯的前提是家庭崩解，家庭義務消失，而改革開放卻使得家庭意義穩固。要求婦女進入生產，但是家庭負擔其實並未減少，這是要求婦女在一個不平等的基礎上和男性競爭。中共以生產力的角度企圖提高婦女的地位，要婦女進入公領域勞動，但是既然是一個不公平的競爭，此舉無異是合理化婦女的弱勢地位。
2. 在一胎化政策中中共以農村需要生產力的原因解釋農村偏好生育男孩的原因，但是事實上在農村卻存在著勞動力普遍女性化的現象，所以因為不同經濟型態而有不同的性別需求這種說法只是認為女性勞動力「本質上」不如男性的偏見。
3. 要求婦女進入公領域生產以提昇地位的說法是再一次的將私領域的勞動隱形化，國家並沒有企圖打破公/私、男/女的二分僵局，而國家藉由胎兒性別鑑定技術的禁止將父權的壓力零碎化由個別的夫婦承擔，由個人面對道德的

壓力，國家也消解掉了結構性的責任。

在一胎化政策的運行脈絡之中，婦女的利益往往不是它最重要的考量之一，就如同 Ellen R. Jude(2002)對於改革開放的觀察一樣，中國國家社會的劇烈變革對於婦女處境的改變影響，其實只是一場「意外」而已<sup>53</sup>。但是即便它是一場意外，我們依然發現中共在解讀這場意外，合理化這場意外時，因為性別意識形態的考量因素，它也必須將這場意外賦予一種婦女解放進程的合理外貌。這種將性別納入思考的態度使得中共在衡量問題時具有一種性別的敏感性，這種敏感性可能是中共與其它國家不同之處，我們或許也可以從中解讀為這是中共嘗試去父權化的努力，但是不可避免的，我們發現中共對於問題的詮釋有其自身的矛盾存在，本研究企圖藉由一胎化政策呈現出中共的矛盾，雖然如此，我們也仍然必須要承認中共對於性別平等的努力。

一胎化政策的成因有著諸多的考量，當然最明顯也最直接的考量便是人口與資源的顧慮，但是這種對於人口與資源的顧慮經常用幾種方式來加以表現與解釋，諸如民族的興盛與延續、經濟的發展與進步等，而這些種種的原因歸結起來，一胎化政策最高層的宏觀解釋便在於人口的控制是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所不可欠缺的一部份。

對於十九世紀、二十世紀的任何國家來說，現代化都是一個幾乎不可忤逆的洪流，對於發展中國家，則更特別有著生存上的急迫意義。一胎化政策在中國的出現確實是因其人口壓力使然，不過這樣的強制性政策造成了中國性別人口失調也的確是事實。本研究意圖指出，在中共的一胎化政策之中呈現出了三種的國家需求，分別為國家發展需求、性別意識形態需求以及隱藏性的父權需求。國家發

---

<sup>53</sup> Ellen R. Jude 認為，當中國從事經濟改革運動時，關於女性處境的改變本不在計畫之中，這一項政策在概念上是性別盲，只是為了替國家提升經濟的成長率而已（Ellen R. Jude，2002：1-3）。

展需求意指中共為求生存、經濟發展、民族延續而制定出一胎化政策以控制人口增長，性別意識形態需求指的是在中共的意識形態脈絡中，順應馬克思、恩格斯論述，將婦女的解放目標歸納到國家統治的合理性基礎中，因此其政策雖不必然處處以婦女解放為中心但是也不能夠違背此一信念，在對於一胎化政策的描述中中共也必須以此來自圓其說。然而即便是一個現代性的國家、訴求婦女解放的社會，也並不代表它就完全沒有父權的陰影，國家的自我宣稱重視婦女解放只能作為一個參考，我們真正要討論歧視與婦女處境的問題時，指出父權的位置所在永遠會是最重要的座標，因為歧視不是單方面的受力而已，要解決性別的問題時，「問題」不應該是「婦女」，而是「父權」。就如同大陸對於台灣是界定為「台灣問題」一樣（而台灣稱之為「兩岸問題」），對於「問題」的指稱經常是一種強勢者的語言，而隱藏在強勢者之下的龐大偏見卻總是最難以為社會所發現。一胎化政策之中，它究竟如何界定婦女的地位，它如何宣稱將有助於婦女地位的提高，方式又是什麼，而在這盤根錯節的複雜思緒中，父權的思維方式如何存在，在什麼地方露出破綻，則是本文要指出的重點所在。

本文的研究概念如圖三，在中共的一胎化政策中存在著一套性別邏輯，而這套性別邏輯繼承了恩格斯的論述架構，認為婦女可以藉由再生產的降低從而投入生產，當婦女可以進入生產關係、接觸生產工具之後，婦女的地位便會提高。一胎化政策在中共的描述中便是可以降低婦女再生產負擔的重要關鍵，當婦女的再生產負擔減輕自然就會投入生產，生產力便會提高。當中共這樣的邏輯成立的時候，一胎化政策雖然是突然激烈化了中國社會的性別選擇性生育，但是這不會是一個恆久的現象，因為婦女的地位最後必然會提昇。也正是因為如此，雖然中共自 1978 年推出一胎化政策後性別人口失調的情形就一直存在，但是 1995 年推出的「幸福工程」以及 2003 年推出的「關愛女孩」計畫，也依然是繼續依循這樣這樣的邏輯在推導，中國政府所制定的利益機制，它所希望改變的男女不平等現象，都著重在提昇婦女的生產能力上，因為中共認為婦女的地位要提昇最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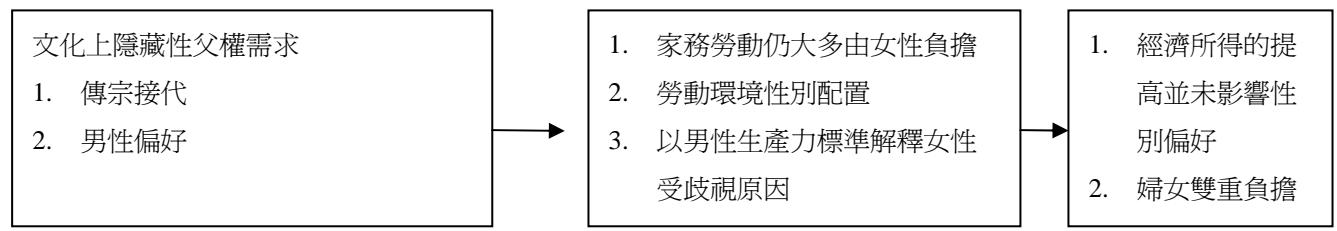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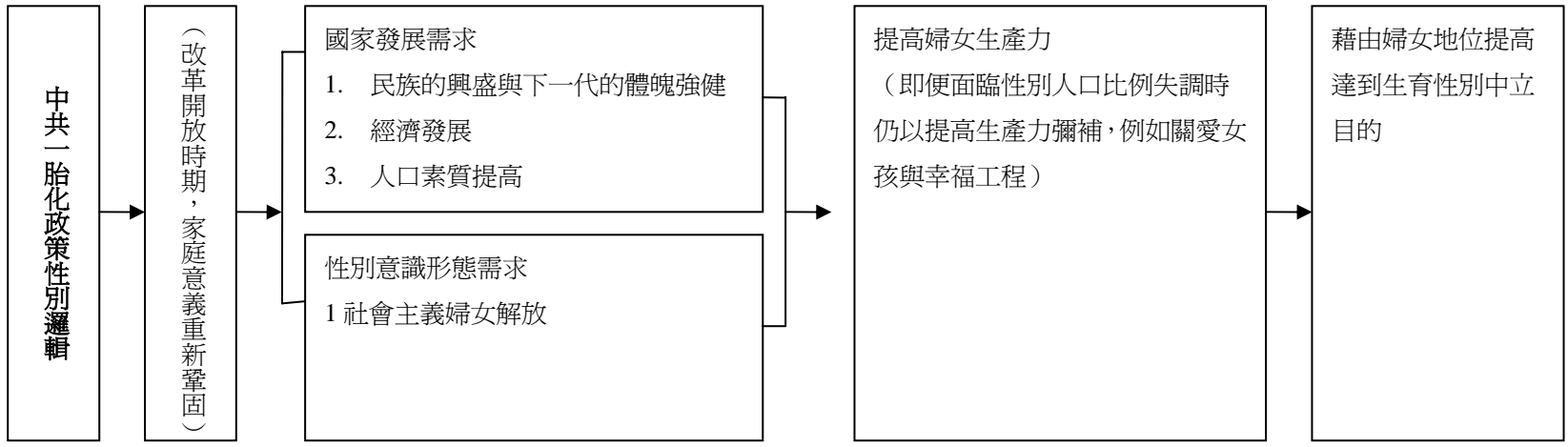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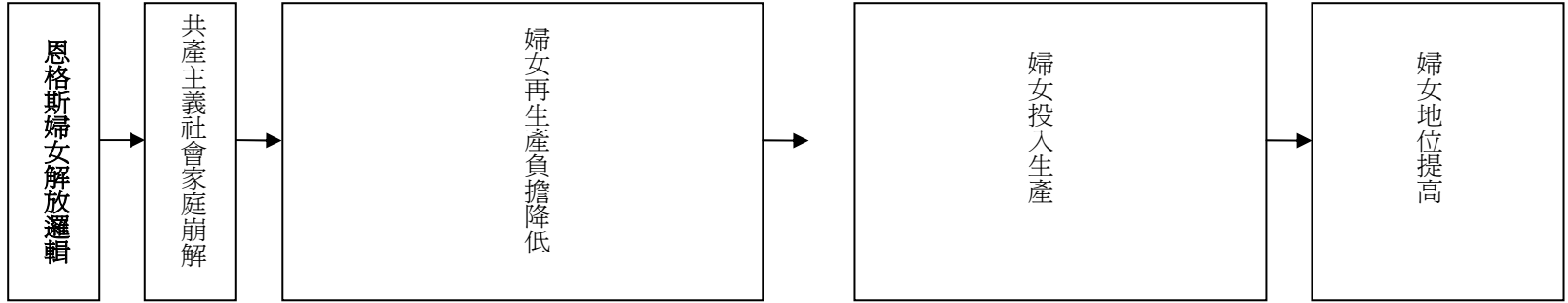
便是婦女可以進入生產，掌握自身的經濟力量。

在這樣的邏輯推導之下，中共的國家發展需求和性別意識形態需求達到了一個幾乎是完美的協調，一胎化政策將有助於國家的發展同時也可以促進婦女地位提昇，而婦女地位的提昇可以降低性別選擇性生育，中國社會才不會性別人口比例失調，而一胎化政策也才能夠因此而完滿。這樣的邏輯看似完美無瑕，婦女和國家彼此互相支撐，但是當我們將它個別的拆開來看時，卻存在著很大的漏洞。第一，在恩格斯的論述中，婦女之所以可以脫離再生產的束縛而投入生產，其存在的大前提便是家庭的崩解，但是中共的一胎化政策卻是和改革開放同時並進的，而改革開放最重要的政策之一「包產到戶」卻是重新鞏固了家庭經濟的地位。當家庭的意義沒有消失反而更加穩固時，婦女的再生產負擔可以得到消解嗎？因此我們勢必提出第二個問題，中共所謂以生育負擔的減輕來幫助婦女投入生產，這種論述是不是窄化了再生產的意義，因為再生產不僅僅只是生育而已，當我們以家庭來作為區分公私領域的標準時，再生產的意義其實也包含了家務勞動以及尚無法或已經無法進入勞動的人口撫養、照護。2001年的「第二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抽樣調查主要資料報告」指出，仍然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家務勞動是由婦女負擔<sup>54</sup>，當這種家庭內的父權偏見沒有改變時，要求婦女進入生產其實只是創造了婦女的雙重負擔，婦女的生產不見得就是回饋到婦女自身。

第三，當婦女必須負擔生產與再生產的雙重壓力時，這也將導致婦女無法和生產關係中的男性平等競爭，諸如此類的落差也就更加加劇了勞動環境當中的性別配置效應，婦女普遍從事的是薪資較低的工作，而其所得當然也就普遍低於男性。當婦女的經濟所得沒有辦法和男性相比的時候，婦女的地位會提昇嗎？如果婦女的地位不能夠因此而提昇，那一胎化政策有辦法因此內在邏輯而最終導回生育性別中立的情況嗎？因此，這也就引伸出第四點，用生產力的不足，或是沒有

---

<sup>54</sup> 參見「第二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抽樣調查主要資料報告」，中國婦女網。



進入生產關係來解釋婦女之所以受到歧視的原因，這種論述本身是存在缺陷的，它隱含了將不平等問題本質化的危機。婦女並不是沒有生產，也不是沒有投入生產，而是在公私領域的劃分之下，家庭內的生產與再生產是被隱形的，這也就是為什麼恩格斯的論述基礎是建立在家庭的崩解之上，因為只有在家庭不存在，婦女不需要負擔任何形式的家庭義務時，談婦女的生產力才有意義。就算家庭不需要崩解，但是家庭的父權意義沒有改變時，強調婦女的生產力對於婦女地位提昇的意義其實只是作為國家的遁詞而已，它將父權的意義零碎化讓個別的女性去承擔。經濟力量對於女性的意義應該是「賦權」(empower)，而不是沒盡到的「責任」(duty)。

諸如此類的問題一步一步的呈現出，即便中共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即便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將性別作為一項意識形態必須將其合理化到政策之中，甚至在2005年宣稱性別平等將作為一項基本國策，它都有可能存在父權的思考。事實上，最明顯的例證便在於，當中共用生產力的標準來看待女性，加強婦女的生產力以達到性別平等時，這其實就是一個假性中立的父權式思考，以男性的生產力標準來看待女性，以此說明婦女的受歧視處境在於其生產力的「不夠」。

在一胎化政策中，中共大力的強調生產力對於婦女的重要性，我們不斷的見到一個命題反覆出現：經濟的自主將有助於婦女地位的提昇。但是經濟真的是改變婦女地位的最關鍵因素嗎？Mitchell (1975) 曾經指出，婦女在家庭之內的生活受到三種因素決定，一方面是經濟，這一部份可以經由生產方式的變動而有所改變，另一方面是「生物社會學」(biosocial) 的層面，這受到女性生理和社會環境之間的互動而影響。第三個方面是意識形態的層面，也就是女性如何與男性互動、保持何種關係。因此，雖然經濟層面可以藉由物質的變動而改變，但是生物社會學以及意識形態的層面卻無法以物質的手段改造。婦女解放的問題之所以如此複雜，也正是因為家庭所要負擔的不僅僅只是經濟而已。

事實上，負擔家務再生產或者是從事生產本來並不需要有所價值上的優劣之分，當中共不斷的強調婦女必須走出家庭，投入生產才能夠提昇地位時，這其實也隱含了一個論斷，那就是說，家庭之內的工作不是一種有助於地位的勞動，家庭之內的工作是次級於家庭外的工作的。當我們一昧的重視生產的重要性時，雖然這可能可以作為一種詮釋的角度，來解釋婦女為何是處在一個受宰制的地位，但是與此同時，我們也會因為過於強調「宰制」的事實而將婦女在「再生產」領域中所作的貢獻全都抹煞。

上野千鶴子指出，生產與再生產的分離其實是一種近代的概念，事實上，這兩者並非是相互抵觸的，因為在女性的生活當中，生殖成為全部的時間其實相當短暫，而男性也需要從事許多再生產的工作。只有將男性的再生產工作最小化，將女性的再生產工作最大化，才會形成生產與再生產分離的社會，而這正是一種性別配置的表現（劉靜貞、洪金珠譯，1997）。事實上，婦女的地位不高並不是因為生產力不高，而是婦女被性別配置的再生產不被認為是生產力的一部分，而將私領域的意義隱形化正是父權的一種表現。婦女要進入公領域生產，這意指婦女力圖打破這種公/私、生產/再生產、男/女二分的境地，但是當中共要求婦女必須藉由生產力的提高，亦即，私領域的勞動力進入公領域，再生產的勞動力釋放進生產，這並沒有打破不管是意義或是地域上的二元劃分，它只是再度的肯定私領域與再生產是較為弱勢的，雖然弱勢，但是依舊存在，依舊隱形而且曖昧不堪。這種二元劃分依舊存在，婦女依然負擔了大部分的家務勞動，並且從勞動環境的性別配置上來說，這種二元配置也被複製進公領域了。

當 Hartmann 論證婦女必須藉由接觸生產工具以掌握自身經濟力量時，她的本意在於，婦女應該多得經濟的權力，接觸生產工具來為自己賦權。但是中共的解釋卻成為婦女必須提昇生產力才能夠提昇地位。然而中共的價值判斷將公領域

生產力與地位做出連結，提出了這種價值判斷來來要求婦女遵守、努力，但是這種論述卻也從而坐實了男性的社會地位比較高是自然發展的論述，因為中共已經先假設了男性的生產力是比較好的。中共的解釋變成，生育的抉擇問題是也一個生產力上的抉擇問題。但是並不是因為生產力的考量使得父權偏好生育男性，從農業女性化的例證中就可以明顯知道，即便農業已經女性化，但是國家仍然允許農村多生育男性以彌補生產力上的不足，偏好生育男性，性別生育無法中立，這是一個父權的問題，而不是生產力的問題。單從經濟的解釋不能夠全面解決婦女地位的問題，父權社會將婦女作為一個分離性的財產，不管婦女的生產力如何，對於原生家庭來說，那就是一個虧本的，因為他的勞動力，以及其所生育的勞動力都將不屬於原生家庭。這是一個制度性的面向，但是當過度強調婦女的生產力問題時，其實又將父權的問題片面化、零碎化了，把問題的原因歸咎到婦女本身，國家嘗試去消解一些父權社會的表徵，但是卻不需要直接的涉入結構性的衝突。

雖然，中共一直強調他的性別中立態度，不管是禁止胎兒的性別檢定抑或是希望提昇婦女地位，但是重複的要求婦女進入公領域生產，而不是肯定私領域的再生產也是力量，這其實是反過頭將父權的壓力個別化到婦女身上。當國家禁止胎兒的性別檢定時，這雖然表現出了國家的中立立場，但是也將是否要做出性別選擇性生育的責任移轉到了個別的父母與家庭身上；而當要求婦女提高生產以對抗父權時，父權的意義被零碎成個別婦女可以自己努力的「生產標準」，國家協助婦女去達到這樣的生產標準，而不需要直接去面對背後的整體文化結構。國家藉由醫學技術上的禁止，使得生育選擇的責任零碎化，國家透過生產力與婦女地位的連結，將不平等問題個別化，父權不再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而國家當然也就不必負起結構性的責任。

父權和國家之間的衝突在於，國家所認知中的婦女是作為一個生產者，一個可以幫助國家發展的生產者，雖然國家瞭解婦女同時也是作為一個再生產者，但



是國家相信加強婦女作為一個生產者的力道便可以幫助婦女減輕其面對再生產的壓力。然而，從父權的角度來說，它要的還是一個再生產者，一個可以幫助父系家庭維繫的再生產者，雖然國家將婦女的子宮視為是婦女自主的身體（可以經由經濟能力的增加而不斷強化自主的身體），但是父權還是掌握了婦女的生育，生育的問題終究不能被看成是一個個人去負擔的道德問題，因為做出這樣的決定或是傾向怎樣的生育偏好，它的壓力是來自於外在社會環境、家庭與親長（Weiss，1993），做出最終選擇權的夫婦只是發展的結果，而不是原因。

在文章的行進中，我們必須不斷的強調中共性別意識形態的重要性與特殊性，當高齡化與性別人口不均等問題幾乎是台、中、港都會面臨到的困境時，這並不代表他們的原因就會一致。雖然性別的選擇性生育問題幾乎是亞洲社會所面臨的普遍現象，包括中國、台灣、南韓、巴基斯坦與印度（Barbara Miller，2001），但是因為國家看待問題的角度不同，對於所謂的父權有就會有不同程度的認知與詮釋，在此基礎之上也就會採取不同的作法。中共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對於歷史的發展進程自有其一套循序漸進的解釋，而婦女地位的變化也必然也依循在這樣的解釋之下。雖然，中共認為社會主義建政成功便象徵了和過去資本主義社會一切弊端的決裂<sup>55</sup>，但是這並不代表父權就必將不存在於國家之中，當父權作為一種文化結構而存在時，就算是女性主義者也不能夠宣稱她自身就完全沒有父權的偏見影響。就如同 Mitchell 所指出的，即便可以藉由物質改變了經濟層面不平等情況，但是女性如何和男性互動的這種意識形態層面，卻不能夠僅僅藉由經濟的手段就加以改造。經濟上的不同當然會帶來婦女地位的改變，但是最終都必須要面對父權的存在。父權並不只是某種歷史時期的附加品，也不是資本主義社會

---

<sup>55</sup>例如 1957 年第三次全國婦女代表大會工作報告便指出：「我國婦女已經從剝削階級的奴役和壓迫下翻過身來，和全國人民一起，成為國家的主人翁。這樣翻天覆地的大變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我國人民取得了人民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的結果。也是中國共產黨正確的婦女運動方針的勝利的結果。這是任何資產階級的政黨所辦不到的，也是不可能辦到的。」建政的成功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象徵著一種和過去的決裂，一個嶄新的開始。參見「勤儉建國、勤儉持家、為建設社會主義而奮鬥——在中國婦女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工作報告」，[中國婦女網](http://www.women.org.cn/zhongyaowenxian/fudaihuiwenjian/di3jie/di3jiegongzuobaogao.htm)。  
<http://www.women.org.cn/zhongyaowenxian/fudaihuiwenjian/di3jie/di3jiegongzuobaogao.htm>

獨有的特徵，父權的問題其實並不附屬於任何經濟形式之上，資本主義或是社會主義都是一種社會表現的歷史形式，但是父權和它們的結構並不具有絕對性的關聯，也許父權會藉由不同的社會形式、結構而表現出不同的樣貌，但是這並不代表某種重要的歷史社會形式便是父權之所以發展的重要根基。就像是中共，她即便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即便是她採用了和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部份趨近的解釋（當然有很大的程度不是），但是父權的問題也不會就此解決。雖然我們肯定中共對於父權的努力，我們也不能夠否認一胎化政策在某種層面上確實是幫助婦女脫離了再生產的負擔，但是關於婦女、生育與經濟之間的關聯我們還需要更細緻思維的整理。雖然父權存在於各種的社會結構之中，或者說社會主義指稱父權是與資本主義相連結，但是我們以社會主義的標準去對中共自身進行比對時，還是能夠找到其中矛盾之處，這種論述上的陰影，正是父權的障礙所在。

而正是因為國家的面貌如此多元，男性的利益如此分歧，所以父權表現的面貌才會如此的龐雜。許多後現代女性主義者憂慮，在一切都相對化的情景中，女性將難再結合為一整體，女人將不能成為一個階級反抗父權，因為不同種族、階級、國家的女人面對不同的處境將擁有不同的利益，而這將嚴重削弱女性主義的政治力量。但是正如同 MacKinnon 駁斥 Luxemburg 批評資產階級的婦女是「寄生蟲中的寄生蟲」(parasites of the parasites of the social body) 般，在這種邏輯中，無產階級婦女也不過是「奴隸中的奴隸」(the slave of slave) 而已 (MacKinnon, 1989: 9)。雖然多元的女人有多元的面貌，她們不需要發出一樣的聲音，她們或許彼此之間在利益上也有爭執與糾葛，但是在男性宰制的國家機器中，她們所面對的卻是一樣的父權本質，而這也正是女性主義「立場論」所藉以批判男性知識權力體系的最大立基。當女性主義知識論批判那些聲稱具有普遍性高度的、中性的客觀理論時，並不需要因為自身的出發點不同而自亂陣腳。女性主義不需要有一個統一的國家理論或是統一的經驗，因為不同國家、經濟、社會形態中，父權表現出的形貌也是如此多元分散，然而指出並批判這些國家中的父權成份才能夠

讓女人進入國家、成爲主體，擁有勾勒一個適於兩性和諧生存社會的力量。女人不需要一個統一或者具有高度普遍性的國家系統理論，因爲批判父權的本身，就是在建構一場非常堅定而浪漫的國家想像。

## 研究貢獻與反思

在緒論的第一節（頁一）便已經提及，執中國婦女研究牛耳的學者李小江認為，當討論中國的一胎化政策時，西方國家並不瞭解中國的特殊情勢與作法，因而他們的批評與指責只是突顯出一種西方中心主義的自以為是而已

（Greenhalgh，2001）。雖然，強調在地性、自主性並且具有批判意識的思維模式向來是女性主義所標誌的知識大旗，但是當這樣的旗幟由一個我們過去所認知的極權國家來掌控時，我們不免退縮、懷疑，並進而思考關於反霸權、反單一、反宰制等正義呼聲的合理性與背後意義。

這並不是說先替女性主義或是第三世界與後殖民等思潮架設起一個正義的帷幕，再以後現代的那種把一切都泛相對的觀點來加以戳破它。相反地，中國的案例反而給了我們，不管是台灣抑或是其他地區的女性主義者一個思考的機會，當性別的維度已經成為檯面上的主流，當國家或者是政府，乃至於強權，都將性別敏感以及女性地位作為強調的重點時，我們怎麼判別什麼是真正能夠促進性別平等的，而什麼樣的政策在華麗的宣傳下只是呈現出一個自我安慰的、「反父權」的父權心理。

這樣的問題困難在於，我們必須去質疑「批判」本身的正當性。

中國作為一個印象中極權的國度，當我們企圖指出它父權的部份時，似乎是絲毫不足為奇的，但是當我們想要進一步去批判其父權時，卻又面臨到許多障礙，因為中國政府有其自身的性別觀點，因為中國政府有許多的婦女組織，因為中國根本反對外力的、嫁接的、西方霸權式的指責。在一胎化政策的案例中，我們看見了中國政府對於性別平等的諸多努力，在這些努力的屏障下，很容易令人

相信也接受政策所不足之處來自於國家的侷限，問題是出自於人爲所無法完美達到的那片灰色地帶。中國是父權的嗎？中國在種種西方所沒有面臨的壓力之下所做出的抉擇真的是男性中心思考的嗎？我們是否是以一種過度嚴苛的「結果論」標準來檢視父權，卻忽略了政府企圖「去父權化」的努力與嘗試。

在中國的一胎化案例中，我們的確是必須肯定政府的確有對於性別做出的努力，但是這樣的努力並不能夠等同於不必繼續將性別作爲中心點反覆的檢視與思考。在一胎化政策的動機中，呈現出中國對於性別的意識形態，我們可以檢視的是這種意識形態是否有其缺點存在，缺點的部份是否可以作爲借鏡，而優點的部份又如何來加以學習。

本研究指出了中國性別意識形態中自相矛盾的部份，一方面，我們可以對於女性地位、身體與經濟的聯繫做出了更清楚的釐清，經濟地位的提昇與生育或是婦女地位之間的相互關聯需要更進一步的思索與考量，而另一方面，本研究也企圖從這種性別意識形態的角度試圖呈現出一種不同於以往一胎化研究的思維方式，畢竟選擇性性別生育的現象並不是只有中國大陸所獨有，這幾乎是亞洲國家的普遍現象，如何去解決這種問題，中國的解決方式爲何不起作用，我們需要用各種的角度去加以論證並詮釋。

最後，最爲一個跨文化的性別研究者，本研究嘗試如何避免掉外來眼光的優越批判，以深入文化脈絡的方式比對、討論出其中的矛盾點。然而，作爲一項比較的研究，關於中國的一胎化政策實在還有太多需要我們深入討論與研究之處，本研究提供一個不同的視野基礎，從一個另外一個角度理解中國，並希望對未來的研究發展也有所貢獻。